

王江宏 李毅刚 主编

税道长安

李胜良 ●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王江宏 李毅刚 主编

税道长安

李胜良 ●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图书代号: SK12N025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税道长安 / 李胜良著. —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2.5
ISBN 978-7-5613-6179-5

I. ①税… II. ①李… III. ①地方税收—经济史—西安市—古代 IV. ①F812.741.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3377号

税道长安

著 者/ 李胜良

主 编/ 王江宏 李毅刚

责任编辑/ 王丽敏

封面设计/ 丽刊传媒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陕西天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0.5

字 数/ 110千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613-6179-5

定 价/ 33.00元

序

税收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它使散居的部落联盟有了组成国家城邦的基本保证，也是国民获取安全保护和其他公共服务不可或缺的财政保障。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就是这个道理。“税收促进发展，发展改善民生”，这既是税收的起因，也是税收的目标，更是我们税收人应该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每当我们回顾那些盛世历史的时候，税收自然而然就会成为一个难以跨越的话题。自夏商周开始到元明清的四千年古代史，赋税制度从无到有，逐步变革，先后建立了夏商周时期的劳役田租税制，秦汉时期的田租口赋力役税制，魏晋南北朝隋至中唐时期的租调与租庸调税制，中唐以后至明中后期的两税法 and 明后期至清代的一条鞭法，共有五个相对稳定、实行时间较长的税制阶段，它们对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应有的历史作用。

纵观赋税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周代首创的中国税收雏形，还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所开创的“以民为本”的税收思想；无论是以税收改革为核心的商鞅变法所奠定的大秦帝国，还是以“与民休息”、“轻徭薄赋”为特色的文景之治带来的中国第一盛世；无论是“以人丁为本”、“法制均一”税收政策锻铸的泱泱大唐，还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税收所创造的发展奇迹，都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税收文化内涵，打造了盛世“税道”的精髓，其中很多赋税思想就来源于西安还叫长安时候的这块风水宝地。追寻税收的本源，找准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以为正是编者們为这本书起名为“税道长安”的初衷和本意。

希望这本税收历史的文化读本，围绕“税”这个主题，通过对盛世王朝历史沿革的回顾，使公众更多关注和思考税收这一关乎国家兴亡的焦点问题。同时希望能借税收这把钥匙，打开这座城市文化记忆的大门，使历史不再单单只是作为一部严整的地方志，或者历史教科书，而是变成一个贯通古今的桥梁和透视未来的窗口，并让它带领着我们跳出悠悠缅怀的俗套，而获得长安那些曾经的华美片段传递给今天的古老启示。

陕西省地方税务局长 批作
2012年3月28日于西安

目 录

第一章 盛地

- 1 帝都
- 4 盛世
- 12 税收

第二章 周颂

1

- 21 文王拘演
- 23 武王鼎革
- 30 周公奠基
- 40 成康之治
- 44 国人暴动

第三章 秦功

- 48 秦继周统
- 52 遂霸西戎
- 55 商鞅变法
- 63 始皇一统
- 74 永为秦殇

第四章 汉风

- 82 帝出草莽
- 88 汉言文景
- 96 天汉雄风
- 112 盐铁之辩
- 117 新莽代汉

第五章 唐韵

- 124 隋炀悲歌
- 132 贞观之治
- 139 开元盛世
- 143 安史迷局
- 152 冲天香阵
- 156 后记

第一章 盛地

绛帟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
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到凤池头。

——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

1

一、帝都

西安城的鼓楼上，四个大字灼灼放光：“文武盛地”，凝聚了对十七朝故都的一份骄矜^①，放射着对周秦汉唐千年长卷的一份荣耀。虽经势易时移万里风霜，当年的殿堂楼阁模糊难辨，那曾经帝都、曾经盛世、曾经天朝的强悍精神与厚重文化，却已深深植入土壤、浸入血液、融入苍穹。万物皆可废，唯千余年积淀的地域性格与人文气象，能不受外力的击打而绵延薪传，有口皆碑。那“秦中自古帝王州”的辉煌，那“长乐未央”的辉煌，那有着皇皇周颂、赫赫秦功、泱泱汉风和铮铮唐韵的千古辉煌，都凝固了。凝固在这城墙的夯土里，凝固在《史记》的纪传里，凝固在古琴塞外的音调里，同时也凝固在每一个汉人的心里！^②

这是一块神奇的地方。

似乎从演绎自己神奇的那一千多年里，它已经被称作“关中”了。可在那为它演绎神圣的诸多决策者看来，甚至愿意将其视为“地中”。“地中”者何？《周礼》如下言之：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

①这是中国古都学会第一任会长史念海的观点。所称十七朝分别为西周、秦、西汉、新、赤眉、更始、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大齐、大顺，共1077年。

②王蒲然：《望未央》，太白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9页。

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

无论在哪一个朝代，处于陇关、函谷关、武关、临晋关、萧关之间，西起宝鸡峡，东到潼关，面积约为3.4万平方公里^①的关中平原都不可能是地理意义上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之地。可在农业时代、冷兵器时代、自然经济时代，这里又实在可以倚为政治、经济、军事意义上的重心、腹心所在。用张良的话说：“夫关中左肴、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一语道破天机。它不仅揭示了“四个在我国历史上最强大繁盛王朝”^②纷纷定都在关中盆地中部西安小平原上的根本原因，甚至预示了宋以后诸朝放弃关中并极力贴近运河建都以求“委输”的缘由。至

2



①潘明娟：《周秦时期关中城市体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3页。
②朱士光：《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

少在唐以前，关中之地的“陆海”、“膏腴”、膏壤、沃野是曾经大大地泽被了这片土地上的王朝和人民的^①。汉代东方朔说在“八水绕长安”的关中平原上，每亩的价格高达“一金”^②。即使到了清代，顾炎武仍认为建都之地以关中为上，洛阳次之，燕都又次之，这是因为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也”。

借了张良之言在特定时段的科学合理性，如今西安的周围凡建都十七遭，以都城身份存在长达一千多年，成为华夏文明的破晓之地。也就是说，当中华文化刚刚以汉字的面目清晰地展现，它最集中的、美好的、迷幻的时光，都是在这个主要称谓是“长安”的地方度过的。

这还仅仅局限于西安古都圈而言，即只包括周朝王城丰、镐，秦国都城咸阳，汉唐都城长安等很小的范围。如果加上它的影子，即那个“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并时常作为长安副都、陪都、备都的洛阳，大西安古都圈的覆盖朝代可望超过三十朝、时间可望超过二千年，真可以说是三分历史有其二了。毕竟，洛阳与西安的关联度太高，高到了时常不分彼此的地步。西周灭商平定天下后，即在丰镐旧京即“宗周”之外营建洛邑，称为“成周”，而平王东迁后的东周则实际地定都于洛阳；西汉曾都洛阳，后来定都长安，到了东汉光武中兴后，再次定都洛阳；唐开国定首都长安后以洛阳为副都，合称“两京”，而武后的“大周”则定都神都洛阳。我们谈论周朝，我们谈论汉朝，我们谈论唐朝，都不大可能将西安与洛阳割裂。二者合并为一个大古都圈，又有何不可呢？

然则在周秦汉唐之际，洛阳只能算是长安的替补，主角还是长安。那周原、咸阳原、霸陵原、少陵原上的一个个巨型的陵丘和数不胜数的皇家文物都可以见证，中国的历史是如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呈现为这块地方的区域史的。唐代诗人李频有一首《乐游原春望》，写出了此间的巍峨和博广：“五陵佳气晚氛氲，霸业雄图势

①田培栋：《陕西社会经济史》，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页。

②陈桥驿主编：《中国七大古都》，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自分。秦地山河连楚塞，汉家宫殿入青云。”金代赵秉文则隐隐望见了那不散的王气：“渭水桥边不见人，摩挲高冢卧麒麟。千秋万古功名骨，化作咸阳原上尘。”

就是在这样一个屡次定都的神奇地方，阅尽了一个个王朝的起承转合、兴衰成败、盛世末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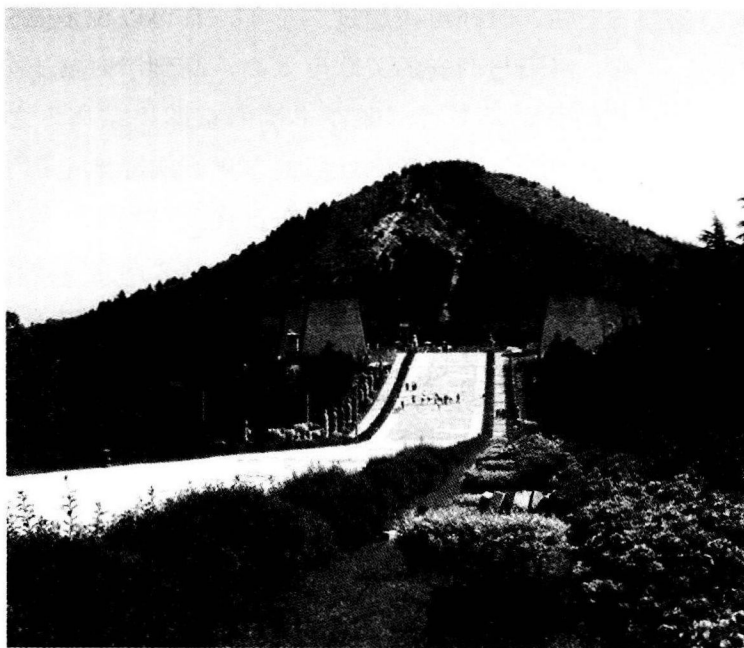
二、盛世

周秦汉唐的历史上，从皇城达于各地，兴起过一个又一个河清海晏、国泰民安的盛世。抽象掉诸多不愉快的人事和不和谐的音符，你可能会在恍惚之间，将长安视同于盛世，或把盛世幻化为“长安”。

“长安”之谓，长治久安，本身就寄予着对盛世图景的几多期待。

而本书之所以命题为“税道长安”，也正是期望在治税之道和致治之道间寻到一些有机的链接。

盛世虽然只是王朝链条中光焰夺目的一个环节，它却极可能是那个王朝的标志性LOGO。正如我们谈论唐朝，有时指的其实只



乾陵御道

是盛唐，只是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的百年繁华。可在偏于文学的语境中，人们宁可将整个有唐一代泛称为盛世。

可盛世毕竟只是王朝命脉中美不胜收的那一个瞬间、时段或者时期，是王朝作为一个躯体在身心诸方面都呈现为健康向上的时期，是王朝作为一个生命最为年富力强、活力无限、体态丰盈的时期。不论盛世是不是可能到来，也不论盛世能够在何时到来并到何时结束，更不论盛世的规模内质是不是可能超越前代，它也只是王朝命运周期律的一环。从初世到盛世，再到触顶向下的衰世和末世，才构成一个王朝生老病死、兴衰荣辱的生命循环。

历史上的盛世并不都是一样的，它们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类型。比如有成康之治那样的平安型盛世、贞观之治那样的复苏型盛世、汉武开边那样的王霸型盛世，还可以有秦始皇一统时期的征服型盛世，又有表现在王朝衰落趋势下的反弹型盛世如各类中兴。

可盛世又从来不是漫无来由的。夏桀、商纣、秦始皇、隋炀帝，没有一个不是虎虎有生气。可为什么，同样追求千秋功业的他们有的却成为亡国之君？唐太宗、唐玄宗的个人禀赋并没有格外的出奇之处，而成王、康王、文帝、景帝，其个性甚至是黯淡无光的，他们又为何开创了一个强大的王道乐土呢？此中一定有原因。

好在，有一些外观上的规律性，让人们依稀接近根本。

比如说，历朝的盛世多发生于王朝的前半期，且基本是受到第一代、第二代帝王的英明铺垫，又有第三代及以下帝王的勉力坚持，并形成于第五代帝王之前。如成康之治和文景之治都是成形于第三代、第四代帝王；贞观之治经武曌当国至于开元之治，是从第二代帝王至于第五代帝王的一个断续传承；康乾盛世则是第二代至第四代帝王的细密传递。这至少突显了第二代帝王的关键作用，秦与隋二世而亡，就放弃了建立足够长宽高维度盛世的可能性。

比如说，历朝的盛世都需要有一个或一个以上具有相对较长的寿数且雄才大略的明君的启动、倡导或发扬，如成康之治的奠基者是周公，文景之治的发扬者是汉武帝，贞观之治的主角是李世民，康乾盛世则有康熙和乾隆两大名君。

再比如，盛世的启动需要帝王低调、理性，有着对百姓疾苦与王朝兴衰的清醒认知。过度的高调或过度的独断，每每陷入损民过甚而致天下扰攘的乱境，在特定状态下难以达成长治久安的境界。

盛世是一个王朝利于统治的各方面因素因缘际会的结果。泛泛说来，盛世是一国各种因素井然匹配，天、地、人、术、势辐辏契合，上上下下和谐充盈，各种矛盾得到缓和而社会生活稳健富足的那么一种至高境界。具体说来，盛世即一个国家内政外交均有重大建树时的状况。可它在外观上却有着一些大致相近的表现，可以归纳为十要素，即政治清明、社会祥和、经济富足、军事强大、贸易远达、科技发达、思想活跃、文化繁荣、税源丰裕、制度优越。另外，还要有三个相对性指标，即时间持久^①、史上最强、世界领先。

盛世的首位要素是和平。几乎没有一个盛世是在战争环境下形成的，尤其不可能是在战火连天的国内战争的状况下形成。为什么大多数的盛世往往呈现于王朝命脉的黄金分割点上？恰恰就是因为，进入王朝的内涵发展期，战火硝烟已经淡去，政府的劝课农桑政策正紧锣密鼓，人心思安，任是一些“反贼”都有了倦怠之意，底层的民众都沉浸在“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农夫之乐中。战争中逃走的人们陆续返乡，漂泊在外面的人们也就地获得了田地，村庄里升起袅袅炊烟，田野里渐多开垦的农民，家居里端坐着织布的妇女，城镇间穿梭着勤勉的货郎。因为战争而人口大减的局面在和平之世里一天天地改观，也许只有瘟疫和战争才能节制住的生育之门豁然洞开，人间再次升腾起“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素朴期望。

与和平伴生的是安定，是民风尚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社会治安井然有序，是数十年无刑错。正因为和平，因为有新政府确保下的和平，因为每个人都被赋予了以劳动换取果实的机会和可能，因为在诸多朝代逐渐地被兼并、集中从而让一些人失去人生根基的土地资源再次授予人们，土匪少了，闲汉少了，盲流少了，从而使社会治安状况大大好转。

因为和平，因为安定，因为安居，因为乐业，社会经济也在缓慢

^①古代称三十年为一世，所以，理论上说，盛世不应少于三十年。可这也不应是绝对的。



含元殿复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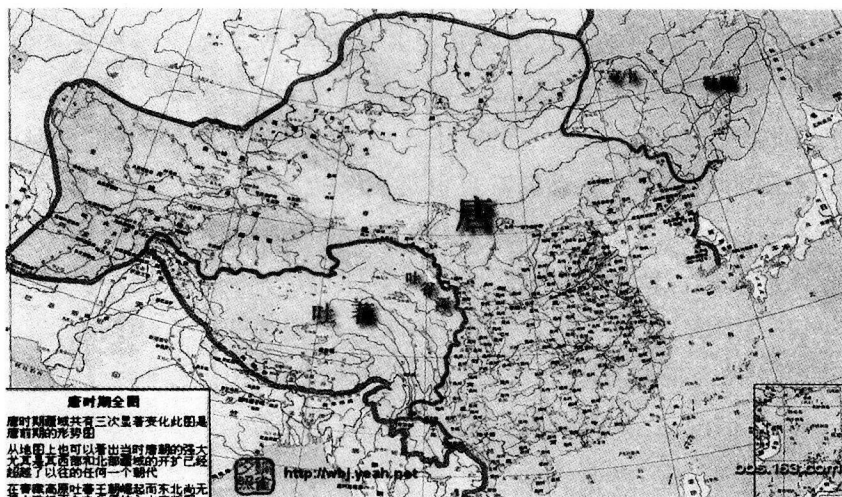
但是坚定的步幅下昂然复苏。这样的日子越久，百姓的囤里和国家的仓里越积聚了厚实的粮谷，百姓的柜里和国家的库里才有了越来越多的钱财，税收通过一个自然而然、不苛不暴的方式如涓涓细水长流至政府各级。于是国家富强，百姓富了，一切的一切都有了可以认真讨论和策划的基础，这也是盛世将要或正在到来的迹象。

盛世的关键要素是富足。有了和平时便期待富强，而富又是强的前提。一个富庶的国度总是意味着基本可信的国家竞争力，而经济实力也确实就是构成“国力”的主干。可是，当国家整体的财富还只是一个有限的额度时，所谓的富足也是初级的、有限的、无常的。于是就存在着国富而且民强、国富但是民穷、国穷但是民富的不同处理方式。比如有若，他就强调君民一盘棋。《论语》载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比如商鞅，就强调“必令穷者富，富者穷”，为了国家可掌握财富可观有效而不时地对民众享有的限度进行干预。在管仲与齐桓公谈国富与民富关系的《管子·山至数》中，管仲如此讲：“王者藏于民，霸者藏于大夫，残国亡家藏于篋。”对于百姓而言，

唯有国民同富，才是真富。对于政府而言，只有国民同富，才会有可以信赖和期待的内生需求和购买力。盛世可以通过好多参数表现出来，比如人口，比如土地，比如疆域，比如物价，比如税收。而其中相对比较集中的参数，则还是标记了富足状况的经济参数。

对于百姓尤其是文化人而言，盛世的可敬要素是政治清明。但清明可以确保人们得到应有的尊重，却并不一定肯定地确保他们衣食无忧。所以说，衣食足，或者说是生理的需要得到满足，总是人们要求更高待遇的前提。在中国古代社会，地理诸条件决定了仅仅得到和平与富足就已经很难了，遑论过分的清明。于是，中国的老百姓虽然有着强烈的“明君”意识、“青天”意识，他们却视之作为一种奢侈。这也正是为什么如康乾盛世里有那么严厉的文字狱，寻常百姓仍然漠不关心而沉浸在丰衣足食的满足中。用王子今先生的话说，“盛世”与“衰世”相比，大略比较安定，可以给予民众比较宽松的生存空间，给予社会比较有利的发展条件。历史上多次形成的所谓盛世，常常是执行比较合理的政治原则，成功地调节阶级关系，完善社会秩序，而终于得以实现的^①。

盛世的高端诉求是强盛。秦汉、隋唐、明清分别被称为中华帝



大唐疆域图

^①王子今：《唐人历史意识中的“文景之治”印象》，载《人文杂志》2004年第5期。

国的三个时代，其中就无不充斥着频繁而剧烈的军事征服。“帝国”何谓？用孙皓晖的话说就是：通常意义上，“帝国”是一个历史概念。它一般包含三个基本标准：其一，统一辽阔的国土（小国家没有帝国）；其二，专制统治（民主制没有帝国）；其三，强大的军事扩张（无扩张不成帝国）。无论是进攻性的还是保守性的，任何一个强大的帝国都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规定性：一是四夷宾服；二是大国外交；三是贸易图远。而以“开边”为主要形态的军事殖民，每每是一个强大国家的外向特征。而这几乎又是中国的诸多盛世之所以被被誉为盛世的心理基础。为什么文景之治的“无为”需要借助汉武帝的“有为”来调剂？因为文景之治太甜腻了，太局限了，太小气了，太狭隘了，太不解气了。为什么明明知道隋炀帝对高丽的开战消耗了自己的国力并最终引起了四野狼烟，唐太宗、唐高宗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对高丽开火？其中必有帝国的内在规律使然。

盛世的另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是繁荣。这就要反映在科技、思想、文化、艺术等深度的精神需要上了。为什么几乎每个读过中国史的人都向往盛唐？那是因为每个人都能从中寻到自己期许、期望、期待的东西。那里有唐诗，那里有阎立本，那里有唐僧，那里有性灵的解放，那里有红妆时代，那里有胡旋舞，那里有对异族的赐姓，那里有万国来朝的霸气、大气、帅气，那里有世界第一的长安城。

也许，每一个朝代都会有它相对强盛的时段，可是否有盛世，却情形不同。中国历史上最无争议的盛世主要有三组，一是文景之治（延及汉武极盛），二是贞观之治，延及开元盛世，三是康乾盛世。即使是这些，情形也并不一致。因此，有必要按照古人的认知状态区别为治世和盛世，治世是满足了和平、富足等基本条件的统治状态，盛世则是在诸多方面都达标的统治状态。它持续的时间要够长、辐射的范围要够广、影响要够深远、在时人和后人的心头产生的好感要够强烈，可真要求全责备，则每一次史称的“盛世”都经不住推敲。于是，我们权且尊重历史、尊重史书、尊重史论。

要从根本上理清盛世为何到来以及何时到来，只从外观和表面是无从得知的。总有一些内在的规律在运行着，总有一些潜在的因素

在作用着，总有一种冥冥的宿命在左右着，这便是治乱周期律。黄炎培先生如是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①”

夏曾佑的总结更加果断，干脆称之为“中国历史的公例”：大约太平盛世，必在革命用兵之后四五十年，从此之后，隆盛约可及百年，百年之后，又有乱象，又酝酿数十年，遂致大乱，复成革命之局。他还很武断地说，这一原理“与地产相消息，而与君相无涉也”^②。在注意到经济因素的作用后，他却否定了人的能动。这既不好解释秦与隋的二世而亡，也没办法面对“中兴”的延祚效果。

魏斐德通过对中华帝制的研究，对上面的“公例”有所校正和补充：王朝循环表明统治者一个人的放纵可能导致整个王室丧失领地。……如果皇帝是道德模范，那么官员就有可能效仿他。……如果腐败来得太快，导致税收不公、水利工程荒废，农民叛乱肯定会随之而来。……没有任何王朝可以永远存在，但是睿智的统治者有克服最坏情况的可能^③。

如果我们画出一条王朝治乱曲线，便可以从中清晰地看到，它由两股力量你争我夺、此起彼伏地交相作用。这两股力量一是致盛因素，一是致衰因素，每一种因素又由许多丝丝缕缕的细节和方面组成。特定王朝发展中，致盛因素占压倒优势时，是盛世；致衰因素占压倒优势时，是末世。致盛因素小占优势时，是小治（或“中兴”）；致衰因素小占优势时，是小乱，即衰世。

①《黄宗羲定律与黄炎培周期律》2003年3月22日《经济导报》。

②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3页。

③[美]魏斐德：《中华帝制的衰落》，邢军译，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56-57页。